

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纪念文章】

从昆明的“魁阁”到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马戎

193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得到博士学位后，费孝通先生回到全国抗战、处于危急时刻的祖国。当时不少留学在外的中国学生，由于考虑到当时国内战乱的困难条件，做出了留在外国的选择，在抗战胜利后才回国。当时费先生也有可能留在英国，但他却选择了马上回国，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事业。由于当时战争发展的形势，他是途经越南辗转来到抗战后方昆明的。费先生是一个爱国者，在祖国处于最危难的时刻，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和工作条件，而是如何能够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作为一个学者，到当时已经转移到后方的大学里教书育人，可以说就是他的战斗岗位。

对于当时西南联大和其他后方大学里教职工困难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在不少的回忆录里已经讲得很多了，菲薄的薪金使教授们的生活十分拮据，图书和实验室的条件很差，而且还要经常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但是也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和其他后方的大学却培养出了一大批努力有为的青年。当时国家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激发了年轻学子的爱国奋发的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他们克服了恶劣的物质条件，使他们后来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令人钦佩的贡献。

费先生到昆明后，受聘于云南大学，并创办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实地工作站”，这是一个对中国社会开展实地调查工作并培养新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的教学研究基地。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工作站”后来迁至昆明附近呈贡县的一座祭祀文曲星（魁星）的庙里，这就是“魁阁”这一名称的来历。关于“魁阁”及其创办过程和工作情况，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我想在这里讲的，是我对费先生创建这一研究机构的目的、学术宗旨的个人体会，而且我认为他后来创办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时，所希望的就是在这一新的研究机构中把当年“魁阁”的精神延续下去。

一、

费先生在史禄国教授和马林诺斯基教授指导下，受到了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博士论文 *Peasant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的写作与正式出版，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斯基教授在该书英文版的“序言”，满怀热情地写到：“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结果。……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者的最珍贵的成就。……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进攻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费孝通，1986：1-3）。老师的热情肯定无疑给了28岁的费先生以极大的鼓舞，我想这应该是他回国并迅速投入对云南乡村开展实地调查的主要动力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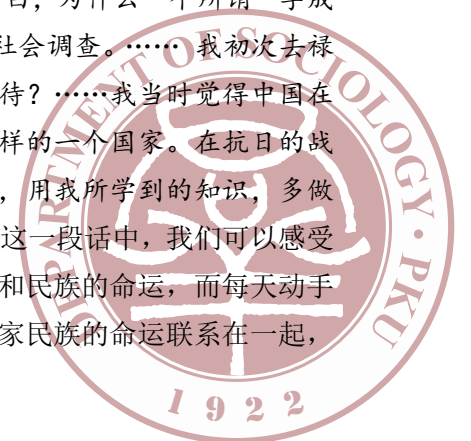
费先生在出国前燕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是吴文藻教授，1938年吴文藻教授在云南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费先生回国后去云南大学，可能也是受吴文藻教授的影响。来到云大后，费先生即提出要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附设一个研究工作站，得到吴先生的同意。要想长期持续地开展中国农村的实地调查，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机构，不培养一个专业化的学术队伍，肯定是不行的。我想这就是费先生创办这一工作站的目的。他当时年仅28岁，刚刚从英国回国，满脑子都是从马林诺斯基“席明纳”（seminar）里听来的新研究思路和各国的调查素材，一定很想把这些调查研究思路在中国的社会里试一试，并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素材和研究成果进行比较。

费先生后来回忆说，“魁阁……是在吴（文藻）老师尽力支持下用来实行他多年的主张为社会学‘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一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内地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尽管1940年底吴老师离开昆明去了重庆，这个小小的魁阁还坚持到抗战胜利，并取得一定的科学成果”（费孝通，2001：51）。

当年参加“魁阁”小组的除主持人费孝通先生外，还有自愿报名参加的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钧以及许良光、李有义等人，这是一支有一定规模的高素质研究队伍。费先生也把马林诺斯基那里的学术风气和研究方法引进了这个小组，“魁阁的学风是从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传来的。采取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到选定的社区里去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在‘席明纳’里进行集体讨论，个人负责编写论文。这种做研究工作的办法确能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得到集体讨论的启发”（费孝通，1990：3）。这是一个年轻的学术团队，它的领头人不到30岁；这是一个团结互助的群体，他们在“席明纳”里争辩学术观点，在日常研究工作中互相支持与帮助。费先生谈到他曾亲自刻蜡版印刷，并积极协助安排小组成员们的论文出版。我们都读过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书中描写了当时大学教师们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团结互助这个方面，“魁阁”也为当时和现代的年轻学者树立了一个榜样。

在费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当时的“魁阁”小组成员们完成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多篇调查报告。费先生亲自参与调查和撰写的有三篇：《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前两篇在1943年曾经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三篇则在费孝通教授访美期间由他编入 *Earthbound China*（《云南三村》）一书，1945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三篇修订后的中文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魁阁”小组的其他成员们还完成了许多其他的专题调查报告，后来陆续在国内外出版，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应当说，“魁阁”虽然前后只有短短的几年，成果是十分丰硕的。

为什么费先生当年回国后不久，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创办“魁阁”及其调查工作中。他自己在《云南三村》的序中做出了回答。“现在很可能有人会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我初次去禄村的日子离我从伦敦到达昆明时只相隔两个星期。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的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1990：3）。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和肩负的历史责任感。他们头脑里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每天动手做的却是最基础的研究工作，这些基层社区的调查研究工作只有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才能够显现出其价值和意义。

总结“魁阁”的特点，可以简略地说，是当时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结合了自己对国家命运和对学科发展两个方面的关切，采用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和“席明纳”的研讨方式，对当时的中国基层社会开展系统与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从而达到认识中国社会的目的，并以此为建设中国社会在理论上做准备。

二、

1945年日本投降，费先生回到昆明，“魁阁”的研究工作遂告一段落。不久费先生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社会学这个学科被取消，他又转到中央民族学院。后来费先生和其他老一代学者们一起，历经“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运动，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些老一代的学者们才有可能重新站到学术活动的第一线，参与恢复与重建学科的工作。

费先生于1979年受中央的委托，开始了在中国大陆重建社会学学科的工作。1980年他首先创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联系筹办了几届社会学讲习班，并亲自组织一些社会学的专题调查研究工作。但是当时的政治气氛反复多变，在“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后不久的1985年，费先生和他的学术助手潘乃谷老师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所。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教委和北京大学丁石孙校长的支持下，费孝通教授在北京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并出任第一任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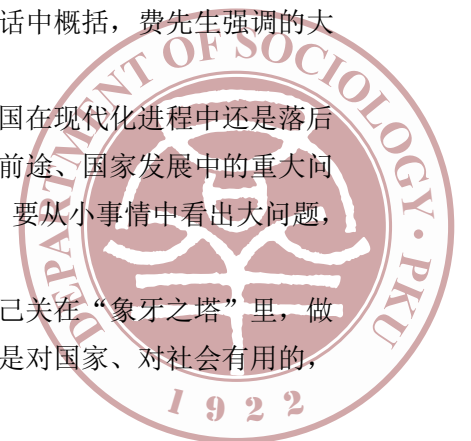
1985年夏天，也就是北大的这个研究所刚刚成立之后，我为撰写博士论文回国从事田野调查，遇到潘乃谷先生。潘老师在70年代曾是我在大学当“工农兵学员”时期的老师，她向我详细介绍了这个新成立的研究所的情况，并表示希望我毕业后来这个研究所工作。当时我和费先生有过几次交谈，他向我建议去内蒙古赤峰地区做农村牧区的社会调查，了解当地农牧民的生活以及民族交往的情况。后来我在布朗大学的导师Sidney Goldstein教授正式写信，邀请费先生参加我的论文指导小组并具体指导我在国内的田野调查工作。1986年底，布朗大学社会学系正式邀请费先生赴美参加我的论文答辩，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费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没有能够出席，但他后来阅读了我的论文并在答辩评阅书上补签了名。

1987年2月4日，我顺利通过论文答辩，3月即回国到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报到。从此便在费先生的指导下开展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至今已有18个年头。

在这些年里，费先生曾多次向潘老师、我和其他同事谈到“魁阁”精神，他始终希望能够以“魁阁”精神来建设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从我记忆的谈话中概括，费先生强调的大致有几个方面。

第一，年轻学者要爱国，要爱自己的国家，关心祖国的命运。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还是落后于西方的，许多民众还是贫穷的，社会学家研究的问题应当是与国家前途、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专题。但是心里想的是大问题，做却只能从小题目做起，要从小事情中看出大问题，通过对小社区的剖析来理解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

第二，社会学家做学问一定要结合社会中的实际问题，不要在自己关在“象牙之塔”里，做花里胡哨、玩弄名词而实际上没多大用处的死学问，研究的结果应当是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



不要“为学问而做学问”。为了紧密联系实际来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中国社会变迁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他在1988年创建了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他特别关心农民的状况和农村的发展，提出他的农村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志在富民”。他也特别关心少数民族的发展，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就是通过考古和历史资料来分析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结构，探讨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

第三，社会学是一门实证的学科，理论必须联系社会实际，不能只读书，更不能只读“洋书”，一定要自己到基层社区去从事调查研究，“从实求知”，从事实中找出规律，总结出真正符合社会实际的真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后来费先生年纪大了，社会地位高了，从事深入的社会调查有困难了，但他还是坚持到村子里和农户家中去访问，他认为只要面对面听到农民讲话，总会听到一些新鲜的东西、一些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所不可能听到的东西。

第四，社会学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一门学问，西方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所以需要对中国基层社会开展调查，在研究中要结合中国社会的传统，理解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运行规则，理解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创建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核心概念和观点。没有“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西方社会学，无法解释中国社会的变迁。“魁阁”小组的调查研究工作，就是在这样一个方向上去努力的。“魁阁成为实践吴文藻先生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和‘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费孝通，1998：513）。

第五，如何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如何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需要在学科视野上进行拓展。从吴文藻先生邀请派克教授和布朗教授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到先安排费先生去清华师从史禄国，又安排他去英国师从马林诺斯基这两位人类学大师，就可以看出吴先生选择的路子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互相结合，即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了解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再把这些知识与西方社会学的成果相比较，吸收西方社会学中有用的部分。所以，在费先生的心目中，中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实际上是融合在一起，是不可分的。1992年，费先生提议把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正式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费先生的提倡和组织下，自1995年开始我们举办了6期“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探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学科间的交融和互相学习。“魁阁”虽然是社会学研究工作站，但是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费先生认为这是对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由吴文藻教授开创的学术风气的延续，他强调这个学术传统应当由今天的北京大学继承下来。

第六，作为中国学者，需要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传统，他常说中国的历史能一直延续几千年，是有其道理的，真正的学术大师都是融汇贯通了国学与西学两个方面，才做出成绩。他曾送给我一套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说钱穆先生有自己的创见，值得好好读。他多次表示希望我们能够吸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对话，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西方的学说，在比较与融汇中推动学术发展。

第七，他希望能够经常开展“席明纳”式的讨论会，来推进队伍成员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与互动，互相启发和促进。我们所的成员们经常去费先生的家里，汇报调查中的收获和研究成果，费先生总是提出问题来，引导我们进行讨论。1998年他提出要对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和“补课”，不仅自己写出了《补课札记》，还对大家提出了具体的补课要求。这些讨论活动可以说是费



先生在新时代开设的“席明纳”。后来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同人组织的研讨会和读书会，也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展开的。

第八，他十分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团结，要我们多看别人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他说当年“魁阁”小组之所以能够做出一些事来，靠的就是大家的团结。如果彼此看不起，彼此拆台，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所以要想做成事情，一定要有“团队精神”，要学会相互欣赏、彼此合作，这样才能在共同努力下做成大事。

在这些年的日常交往中，费先生经常向我们讲述当年“魁阁”的研究工作，希望今天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能够在各方面继承当年“魁阁”的精神与学风。时代虽然不同了，我们今天面临的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不同于 30-40 年代的中国社会，但是“魁阁”的基本精神与学风，仍然应当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楷模。费先生对我们的期望很高，但十分惭愧的是，这些年来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时做得并不十分自觉，没有达到先生的期望，今日面对先生的遗像，从内心里感到十分愧对先生多年的教诲。

三、

费先生的心里始终有着一个“魁阁”情结，它代表着他年轻时的人生理想、学术追求和最美好的一段研究时光。每当他谈起“魁阁”，他的眼神炯炯发亮，整个人似乎也显得年轻了许多，连他周围的人也难免受到感染，与他呼应，思考“魁阁”精神中所蕴涵的那种鼓舞人们去开创新路、团结奋斗的力量。

前几年费先生组织他的几个学生对当年“魁阁”小组成员的调查地点与专题进行再调查，就是想看看经过半个世纪之后当地的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可见费先生不仅一直怀念“魁阁”小组当年的研究生活，也关怀着“魁阁”小组成员当年曾经调查过的乡村社区。“魁阁”始终是他与我们谈话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费先生谈到“魁阁”时充满了感情，“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在我的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位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以客观形势来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是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我们对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报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费孝通，1990：3）。

费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今后仍将在费先生治学精神的激励和指引下，沿着费先生所开创的学术道路继续走下去。在过去的 20 年里，我们曾有许多机会与先生促膝而坐，谈古论今，共同讨论中国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这些交谈使我们获益匪浅，开阔了视野，这些宝贵的时刻和记忆也将永远留存在我们的心里。

参考书目：

费孝通，1986，《江村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1990，《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1998，《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